

# 数据中心与媒介记忆建构

——以贵州省数据产业发展为例

◎ 刘子瑜\*

**摘要:**媒介研究对数字记忆的考察不应当局限于文本与符号的领域,而应当进一步考察其物质性。官方主流叙事对集体记忆的建构,在看似简单划一的统一口径背后,也有着复杂和多维度的协作与冲突。本文以贵州数据产业为案例,揭示了新闻报道与官方叙事通过调取和重组贵州省在地性的历史记忆来合理化、自然化和必然化当地在大数据产业上的发展,建构出一种具有内在矛盾性的“自然/必然性”的发展叙事。这种叙事的产生延续了传统政治宣传式的“亮点式”报道模式,但却不仅仅生发于官方政治宣传目的和平台,同时也融入了市场、商业和资本的逻辑。“自然/必然性”论述通过“亮点式报道”被扩散到大众语境中,进一步引发了个体层面的认同感,从而形成了大众对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想象。

**关键词:**媒介记忆;新闻生产;数据中心;物质性

## 一、引言

“天无三日晴,地无三里平”,这是一句形容贵州多雨、多山的民间谚语。地处云贵高原,贵州省几乎没有平原地区,当地人更会在这句谚语之后再加上一句“人无三分银”来形容贵州省在经济上的落后。虽然近几十年来贵州省发展一直在加速,但直到2015年之前,其人均GDP在全国都排在最后一位<sup>①</sup>,到2017年依然有280万人生活

\* 明尼苏达大学传播学系,博士候选人。

① 林小昭.贵州40年GDP增速居中西部第一,人均GDP不再垫底[EB/OL].(2018-10-04)[2022-03-10].  
<https://www.yicai.com/news/100035069.html>.

在贫困线以下；传统资源依靠型工业和农业依然占全省经济的大半<sup>①</sup>。而就是这样一个历史上无论经济还是科技都处于相对落后和边缘位置的省份，从2013年前后开始，却开始大力发展大数据和云计算产业，希望成为美国“硅谷”或印度“矽谷”一般的“中国数谷”。从2014年开始的每年一届的大数据博览会上的跨国科技公司与商业领袖的云集，到包括腾讯、华为、苹果以及中国移动、中国电信和中国联通三大运营商的数据中心落户贵州，再到2013年经国务院批准建立第八个国家级新区——贵州贵安大数据新区，无不显示出这一地区在大数据、云计算等新媒体技术上的发力。随着政府的政策和投资支持、数以百计的大型企业项目落地以及数千家中小型大数据企业的注册，似乎在某种意义上贵州的确在成为“中国数谷”。

在这样一个历史上经济落后的省份发展当前信息时代最前沿的数字媒体技术，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和现象。从城市到乡村，从政府、机构、民间团体到个人，如何参与这一发展？当腾讯、华为和苹果等世界级的国内外大型企业将它们承载着海量用户数据的数据中心建在贵州时，这里的人又如何理解、接受和想象这些庞然大物所带来的变化？贵州成为数据中心的聚集地绝不能单单从政策或经济角度来解释，而是一个涉及在地的与全球的，与政治经济也与文化、个体和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复杂景观。从数字媒介的物质性实践视角出发，一方面需要重视“数据中心”这一数字记忆的物质化载体，另一方面也需要考察其如何与所在的土地、机构以及个人发生关系，从而使其有机地、合理地融入所在地的政治、经济与文化。从媒介记忆实践的视角出发，可以进一步讨论记忆实践是如何在这种媒介在地性的关系网络中呈现的。也就是说，在数据中心作为事件涌现的过程中，从官方到民间的记忆实践，如何将数据中心与地方记忆建立联系？这种联系的建立，如何调用象征资源，又如何通过新闻生产、机构设置、个体互动等的有机结合，从而使得主流的叙事得以成立？在对数据中心本地化的主流叙事建构中，历史记忆如何被调用和重组，而“过去与现在又是如何纠缠在一起的”<sup>②</sup>？这些话语与记忆的建构，又在什么意义上依托于本地原先存在的机构、文化与政治结构？

① LI J. Go big or go home: Guizhou bets on “big data”[EB/OL].(2018-07-13)[2022-03-10]. <https://www.sixthtone.com/news/1002616/go-big-or-go-home-guizhou-bets-on-big-data>.

② OLICK J K, ROBBINS J. Social memory studies: from “collective memory” to the historical sociology of mnemonic practices[J].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1998, 24, 105-40; 112.

对这些问题的考察,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当新媒体技术与在地性的历史、经济条件碰撞时,话语、历史与想象如何互相交错,官方与民间要素如何关联,从而建构起对数据中心、云端、大数据等新媒介技术的主流叙事,使得数据中心有机地融入当地成为可能。

李红涛和黄顺铭在讨论媒介记忆的边界问题时曾指出,在记忆研究领域,有的学者将媒介定义非常宽泛地外延到一切形式的信息交换:从口头的对话到文字的呈现,从各种媒介技术或装置所承载的内容——电影、电视剧、纪录片、新闻等到媒介技术或装置本身——如博物馆、报纸、电影技术等。而与这种相对宽泛的定义相对应的,媒介记忆研究对“记忆工作”(memory work 或 the work/labor of memorization)的理解又相对狭隘。其狭隘之一为过分关注文本而忽略了“记忆的生产和消费/接受过程”,之二为过分关注纪念性记忆而忽视了其他形式的叙事<sup>①</sup>。也就是说,我们不能仅仅停留在文本分析的范式,也要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考量信息的生产、消费、分配等过程<sup>②</sup>,不能无条件接受官方叙事,而要解构其存在条件、象征意义与功能性。讨论媒介记忆也不应停留于媒介所呈现的内容,还要考察内容与形式、机构、个人等因素如何关联,从而在一个动态的过程中形成媒介记忆的建构。这种建构既包含内容与文本,也包括记忆主体对媒介作为装置和其内容的记忆,以及对媒介的记忆工作。在这个基础上,笔者以为,记忆工作可以说既包含符号与文本在互文性(inter-textuality)<sup>③</sup>中产生的象征意义,也包含个体通过劳动(labor)进行特定方式的对特定对象的信息的铭刻(in-scription),更包含使得对特定对象进行记忆这一事件本身能够成立的政治的、机构的、经济和文化的工作(work)。基于这样的视角,本文将数据中心作为讨论的核心,但并不将其作为孤立存在的媒介技术或装置来看待,而是考察数据中心本身作为事件(event)的涌现(emergence),考察其中的文本、机构、政治、经济、个体等如何在协作与矛盾中与记忆工作关联。这样的概念框架在两个方面区别于仅仅在象征性层面上进行文本与语境分析。

第一,本文不仅仅讨论围绕数据中心的话语建构以及相关的记忆工作,更将对话语与记忆的考察置于“数据中心”这一事件的物质性存在和关联网络之中。这就意味

① 李红涛,黄顺铭.新闻生产即记忆实践[J].新闻记者,2015(7):38.

② MOSCO V.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ommunication[M]. 2ed. London: SAGE Publication, 2009.

③ HALL S. The spectacle of the “Other”[C]//Representation. 2ed. Los Angeles:Sage, 1997/2003: 222.

着,媒体对数据中心的话语建构、对不同性质的记忆(如本地历史记忆、个体记忆等)的调取与重组,以及生产与流通这些不同面向的的记忆的组织,还有与这些不同性质的记忆发生关联的机构与个体等,都是“数据中心”作为事件涌现的一部分,是不可分割的。第二,“事件”从不会从真空中没有前因后果地出现,“涌现”意味着事件的出现往往并不是由单一原因造成的,而是一个多面向的、协调与冲突并存的结果。所以,将文本意义上的话语建构独立于使得这样的话语建构成为可能的机构、人员以及政治与商业等因素进行分析是不可能的,或者说是充分的。这些因素或许并不直接在象征性的层面上参与记忆工作的建构,但是他们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使得象征层面的记忆工作与话语建构成为可能。也就是说,这些要素虽然不直接实施记忆工作,但却是记忆工作能够以当下所被观察到的形式展开的可能性条件(conditions of possibility)。而对这种可能性条件的讨论应是我们理解当下记忆工作的一个重要面向。

基于上述理论视角,笔者将数据中心锚定于媒体、机构与个人的关联中,从媒体的新闻报道、媒介的机构设置与组织架构以及个体的日常生活等面向来考察在贵州省大数据产业发展中,官方叙事如何调取和重组历史记忆来使数据中心的存在成为合理甚至必然;这种叙事本身又是如何被生产、流通,以及个体的记忆与主流叙事之间又产生了何种协作与矛盾。本文将揭示,新闻报道与官方叙事通过调取和重组贵州省在地性的历史记忆来合理化、自然化和必然化当地在大数据产业上的发展,建构出一种具有内在矛盾型的“自然/必然性”发展叙事。这种叙事的产生延续了传统政治宣传的“亮点式”报道范式,但却不仅仅生发于官方政治宣传目的和平台,而是融入了市场、商业和资本的逻辑。“自然/必然性”论述通过“亮点式报道”被扩散到大众语境中,进一步引发了个体层面的认同感,从而形成了大众对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想象。这个过程揭示了官方的主流叙事对在地性集体记忆的建构并不是一个简单化一的过程,而是一种政治、商业、媒介机构与个体相互作用的交染,其权力结构并不是自上而下的单一形式,而是在某些面向上分散的、不稳定的,体现出新闻与媒介记忆在生产 and 流通过程中的多维度性(multiplicity)与偶发性(contingency),以及其中所包含的协作、冲突和矛盾。

## 二、理论方法、材料与文章结构

为什么将数据中心这一存在或现象作为媒介记忆的重要部分作为考量?上文提到的将数据中心视为一种事件的涌现所引出的两个考察视角基于什么理论基础?这里笔者需要回答这两个问题以论述本文理论和方法的出发点。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旷日持久的传播政治经济学与文化研究之争贯穿了传播学和媒介研究学界<sup>①</sup>,这场大论战的核心,如Janice Peck所说,是双方都陷入了“物质”与“象征”的二元对立中,从而无法得到一个“文化的经济”或“经济的文化”。Peck认为,应当在一个“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框架下考量……物质(material)与人类行为(human undertakings)的不可分割性”<sup>②</sup>,从而消解物质/象征二元对立。在更大的学科范围内,这种二元对立的讨论存在于整个西方后现代、后结构、后人类主义的反思中。从法国哲学家德勒兹与瓜塔里对集群(agencement或assemblage)的描述<sup>③</sup>、德兰达的集群理论<sup>④</sup>到拉图等人的行动者理论<sup>⑤</sup>,都在试图破除象征与物质的二元对立,破除对某一单一因素(如文本、经济或文化)的本质化(essentialization)。跳出本质主义(essentialism)的框架,我们对媒介的研究不能局限在象征的领域,因为“象征的”(the symbolic)总是在某种程度上是“物质的”(material),意义并不独立于物质而存在。媒介的物质性正是这一讨

① 关于传播政治经济学与文化研究的论战以及相关的结构马克思主义之争,涉及的相关文献浩如烟海,这里就不一一列出,仅列出几篇总结性的文献以做参考。早期对话可参考1995年*Critical Studies in Mass Communication*第12期的专题“Colloquy”中Nicholas Garnham、Lawrence Grossberg、James Carey以及Murdoch Garnham的文章。其他学者的总结参考:MEEHAN E R. Commodity, culture, common sense: media research and paradigm dialogue[J]. *Journal of media economics*, 1999, 12(2); PECK J. Why we shouldn't be bored with the political economy versus cultural studies debate[J]. *Cultural critique*, 2006(64).

② PECK J. Why we shouldn't be bored with the political economy versus cultural studies debate[J]. *Cultural critique*, 2006(64):97.

③ FELIX G, GUATTARI D. A thousand plateaus: capitalism and schizophrenia[M]. MASSUMI B, trans.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④ DELANDA M. A new philosophy of society: assemblage theory and social complexity[M]. London: Continuum, 2006; DELANDA M. Assemblage theory[M].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2016.

⑤ LATOUR B. Reassembling the social: an introduction to actor-network-theory[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论的落脚点之一:最近的中文学界,有如章戈浩与张磊对媒介物质性转向的综述<sup>①</sup>、曾国华对该转向理论渊源的分析<sup>②</sup>等;西方学界也有以 Brian Lakin 为代表的媒介人类学将媒介作为基础设施进行分析<sup>③</sup>,以及 Richard Maxwell、Toby Miller 等学者对媒介与环境的物质性研究<sup>④</sup>,而在环境与生态学派的影响下,更有如约翰·彼得斯的《奇云》这一类从后人类角度反思媒介与物质的作品<sup>⑤</sup>。总的来说,对媒介的研究早已不能仅仅局限于文本、符号等象征领域,而应当考量媒介的一切形式都以物质的方式与现实实在发生着关联,或者说是组成现实实在的一个重要部分。

在对媒介物质性的反思下,信息时代下的大数据、云计算以及其他涉及大量的数据储存和计算的技术,都不能仅仅在象征或隐喻的维度做考量。Vincent Mosco 在其著作 *To The Cloud* 中详细论述了“云”作为大数据技术的隐喻背后所涉及的政治经济学与文化意义。Mosco 讨论大数据和“云”少为人知的黑暗面,向我们展示了数据中心与大数据技术实际上依靠大量电力与各类金属等传统资源而存在,也就是说,这并不是一个脱离历史的、非政治的、不依赖于传统自然资源的技术;而与之相关的广告、宣传和主流论述却依托“云”这个抽象、纯净的隐喻向全世界售卖绿色和环保<sup>⑥</sup>。在记忆研究领域,Anna Reading 在对“全球数字化记忆”(global memory)的研究中也指出,“数字记忆研究的学者需要更多地考量全球数字记忆的经济与政治维度,从而更好地了解本地的、全球的以及跨国际的记忆实际上在以不均匀、不平等的方式对环境与弱势群体造成显著影响”<sup>⑦</sup>。Reading 提醒我们,数据中心作为数字记忆的物质载

① 章戈浩,张磊.物是人非与睹物思人:媒体与文化分析的物质性转向[J].全球传媒学刊,2019,6(2).

② 曾国华.媒介与传播物质性研究:理论渊源、研究路径与分支领域[J].国际新闻界,2020,11.

③ LARKIN B. The politics and poetics of infrastructure[J]. Annual review of anthropology, 2013, 42; 金斯伯格,阿布-卢赫德,拉金.媒体世界:人类学的新领域[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

④ MAXWELL R, MILLER T. Greening the media[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2.

⑤ PETERS J D. The marvelous clouds: toward a philosophy of elemental media[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5.

⑥ MOSCO V. To the cloud: big data in a turbulent world[M]. Boulder: Paradigm Publishers, 2015.

⑦ READING A, NOTLEY T. Global memory capital: theorizing digital memory economies[C]//Digital memory studies: media pasts in transition, 2018: 205-217. Reading 等人对数据中心作为数字记忆的物质性的其他相关研究见:READING A. Seeing red: a political economy of digital memory[J]. Media, culture & society, 2014, 36(6); READING A, NOTLEY T. The materiality of global memory: bringing the cloud to earth[J]. Continuum, 2015, 29(4).

体,其本身就涉及大量的人、土地、自然资源,以及相关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决策,而这些并不直接实施记忆工作的因素,都是组成数字记忆的重要部分。从这个角度出发,媒介装置和终端——如手机、电脑等——与使用终端的大众并不完全是数字记忆的全部,而数据中心作为数字记忆的储存实体,其如何、在哪里、以何种方式建造和展开,并与当地的人和土地发生多维度的关联,就成为考察数字媒介记忆物质性的重要部分。这同时也意味着,对数据中心、云端等概念的话语和记忆建构并不仅仅是一个文本分析问题,同时也是一个政治经济学问题,即这些文本的生产与流通是基于什么样的可能性条件?

贵州省在数据产业上的发展能够得以以当下所见的方式落地,数据中心的涌现必然与其所在的地方需要产生某种关联性,与贵州本身的经济文化和发展历史产生某种交叉。贵州省作为一个历史上相对落后的地区,之前并无任何在云计算、大数据等当下新媒介技术前沿的发展,笔者对以《贵州日报》和《贵阳日报》为代表的官方报刊进行关键词索引后发现,在2009年之前甚至没有任何与“云计算”有关的报道。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从2013年至今贵州省致力于成为中国数据之都的全方位产业规划、政策支持与大众文化宣传,势必需要各种各样的叙述,使得贵州成为“中国数谷”合情合理,甚至是必然。而“在一个历史上贫穷落后的地区发展最先进的数字媒介技术”这一现象本身就容易让人感到叙事的冲突和不稳定性,而让这种不稳定性趋于稳定,就是一个协商、互动甚至是冲突的过程。这之中所涉及的记忆建构“既非稳定不变,也非瞬息万变,它是一个随着时间推移而持续不断的协商过程”<sup>①</sup>;这个协商的过程,以及其如何被建构、如何被实践、被谁建构又被谁实践,就是一连串重要的问题。

李红涛与黄顺铭在讨论记忆实践时提出“将新闻生产视为记忆实践”,即考察“新闻媒体如何在文化、政治、技术和社会场景中,通过与其他社会机构或社会群体的互动来塑造集体记忆”<sup>②</sup>。两位从三个层面指出具体的研究路径的可能性:其一,要考察新闻文本中的历史元素,即新闻如何对过去进行建构;其二,要考察媒介记忆的生产、消费等所引发的特定记忆的接受过程;其三,要考察新闻生产与大众记忆两者如何互相

<sup>①</sup> 黄顺铭,李洪涛.在线集体记忆的协作性书写[J].新闻与传播研究,2015,1.

<sup>②</sup> 李洪涛,黄顺铭.新闻生产即记忆实践[J].新闻记者,2015(7):39.

建构和塑造。这里需要强调,两位所述并非“新闻”作为记忆实践,而是“新闻生产”。也就是说,我们不能仅仅关注“新闻”的文本和象征概念本身,而应该进一步考察“生产”。笔者认为,“生产”也不应该仅仅狭隘地理解为对某条新闻或某个具体的报刊的生产工作,而应该扩大到考察“新闻生产”在广义上涉及的个体、机构、经济、文化等。上面所提出的三点研究路径正是将“新闻”扩大到广义的“新闻生产”来考察其与不同社会和历史因素的互动,从而进一步定义和讨论“记忆实践”这一充满协商和矛盾的过程。笔者认为这在某种程度上其与本文所述的理论出发点是相似的。

同时,我们在考察集体记忆的建构时一方面需要关注文本,关注主流媒体的叙事,另一方面也要考察不同的民间团体、个体以及他们的日常生活所承载的非理性的、身体的(bodily)和情感的(affective)记忆。我们不能假设一个全能的官方叙事以一种简单而毫无阻碍的方式在个体身上被接受,这种基于简单的意识形态模型的假设早已被中西方学界抛弃。因为记忆往往因为其所属的人群和团体的不同,在不同维度上与官方和主流的叙事产生冲突、矛盾,抑或进一步与主流叙事互相强化。而在本文的讨论中,数据产业的从业人员与官方叙述的记忆生产过程中的个体调查都展现出这种非理性的和情感性的个体记忆。这种记忆作为数据中心这一事件的涌现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体现出在地性记忆建构以及将主流叙事稳定化过程中“个体”的重要性。

最后,从方法上来说,笔者认为,在考察互联网作为基础设施以及数字记忆的物质性实践时,需要考察公开资料、政策与文本,同时也需要考察这些公开资料与文本的存在条件(condition of existence)与生产过程,而这就涉及跨学科的研究方法。在传播学研究对媒介物质性的讨论中,虽然有基于实地考察和具体经验案例的研究<sup>①</sup>,但总体来说文献梳理类远超过经验案例的研究。而在经验研究中,特别是本就极少的对贵州省这一案例的考察中,也还存在许多未讨论的空间。例如,束开荣在对互联网基础设施的讨论中将贵州贵安新区的“数据中心走廊”作为案例,但其经验资料主要来源于互联网公司相关人员的公开言说、媒体的新闻报道以及公开的政府政策,从而导致其案例讨论虽然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描述了当地数字产业发展的构成脉络,但局限在了

---

<sup>①</sup> 如孙萍以外卖骑手为案例对物质性与数字劳工的考察,详见:孙萍.媒介作为一种研究方法:传播、物质性与数字劳工[J].国际新闻界,2020,11.

由官方和主流语境对数据中心在地性发展的话语建构中。<sup>①</sup>也就是说,其案例分析因为方法的局限性没有跳出笔者在本文所分析和解构的官方媒介语境中的“自然/必然化”论述。这就导致作者对贵州的案例所体现出的互联网技术设施的“可见性”的讨论被框定于官方的、主流的语境中以及政府和企业合作中“看见”“云端”这一抽象概念,而忽略了数字媒介如何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被具体的“人”看见、理解和想象。故笔者认为该文虽然提出要讨论技术实践与话语建构两个维度,但没有考虑到这些文本的存在条件与生产过程。我们对媒介物质性的讨论恰恰应当突破传统方法的局限,深入考察本文背后的物质性生产和实践。

本文虽然因篇幅关系只从数字媒介记忆的角度切入,但在方法上破除上述局限性。具体来说,首先,笔者考察在话语建构上,官方叙事如何对历史记忆进行调用与重组。笔者收集整理了《贵州日报》与《贵阳日报》从2008年到2020年底与“云计算”“大数据”“数据中心”“中国数谷”等关键词相关的所有报道,并选取其中重点与“数据中心”相关的81篇报道进行分析;同时也整理分析了与贵州大数据相关的官方性质文宣材料与出版物,如《云上贵州》《中国数谷》《数化万物》《数智未来》《大数据干部读本》《国家大数据(贵州)综合实验区》<sup>②</sup>等。其次,通过对《贵阳日报》旗下的“数据观”这一当地最大、最集中的大数据产业发展全媒体平台的实地考察与深度采访,笔者试图揭示机构、政治与经济因素如何纠缠在一起,使得官方的话语建构能够以一种特定的方式呈现并扩散。最后,笔者结合在从2020年8月开始至今在贵州省贵阳市和贵安新区的田野调查中所获取的经验材料<sup>③</sup>,通过将传统的传播学范式的文本分析方法与人类学和社会学范式的田野调查进行跨学科结合,一方面考察数字媒介记忆的建构,另一方面试图解构这种建构的存在条件以及生产过程,并讨论在这个过程中不稳定性

① 束开荣.互联网基础设施:技术实践与话语建构的双重向度——以媒介研究物质性为视角的个案研究[J].新闻记者,2021,2.

② 孟庆国.云上贵州[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5;大数据战略重点实验室.中国数谷[M].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15;大数据战略重点实验室.数智未来[M].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17;大数据战略重点实验室.数化万物[M].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18;中国大数据产业观察.大数据干部读本[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18;中国大数据产业观察.国家大数据(贵州)综合试验区[Z].[内部资料].

③ 笔者的田野调查与档案调查是基于一个更加宽泛的研究课题,本文的写作按需求采用了其中相应的经验材料。

与摩擦力。

详细来说,《贵州日报》与《贵阳日报》同属当地政府的官方媒体,其报道代表了官方叙事对“数据中心”的话语建构。而“数据观”作为《贵阳日报》报业集团旗下的一个部门,是官方叙事的重要采编部门以及数据中心相关新闻报道和讯息的重要分发部门。“数据观”在2014年在时任贵阳市委书记陈刚的提议下,一开始作为贵州发展数据产业的宣传口成立,但在后续的发展中逐渐转向成为一个以其官方网站为中心,融合微信公众平台、今日头条、Bilibili(B站)等的全媒体平台,一方面独立运营,一方面依托于报业集团本身的体制与组织架构<sup>①</sup>。该机构又名“中国大数据产业观察”,是一个从贵州出发但是面向全国的大数据行业观察、报道、信息发布和出版机构。<sup>②</sup>“数据观”除了进行新闻报道的采编之外,还大量出版和发行其他形式的宣传物,如上文提到的《中国数谷》《数化万物》《大数据干部读本》《国家大数据(贵州)综合实验区》等都是“数据观”编辑出版并发行的。“数据观”首先是全国第一个以大数据产业报道和服务数据产业发展为核心理念的全媒体平台,内容涵盖广泛,包括政策、资讯、专家访谈、案例报道、专栏写作和评论等。其次,其成立之初有来自官方的政治宣传考量,并隶属于传统的国有报社机构,但是在发展过程中又体现出传统国有媒体在市场化与商业化转型中的商业媒体逻辑。最后,虽然面向全国大数据产业,但是机构本身源自贵州也作为实体扎根贵州,深度参与了本地的媒介记忆建构。如果说《贵州日报》和《贵阳日报》的报道代表了传统官媒的话语建构,那么“数据观”的报道和出版物发行则进一步展示了新媒体转型下官方叙事的生产与流通。

下面本文以贵州数据中心的发展为案例,讨论:第一,在《贵州日报》与《贵阳日报》官方叙事的建构中,历史记忆如何被调用与重组来服务于当下的集体记忆建构;第二,“数据观”作为重要的官方背景全媒体平台,其组织架构和信息生产、消费的机制与主流叙事的关联;第三,主流和官方对历史记忆的建构与民间个体的身体、情感记忆的互

① 举例来说,“数据观”在行政上属于报业集团,但是日常采编工作相对独立进行,同时其技术支持(如网站搭建和维护等)又来源于报业集团的技术部门。

② 除特别注释之外,本节涉及“数据观”的相关信息主要来自笔者于2021年2月20日实地考察和参观“数据观”办公地点,以及20日与28日两次分别与该机构两位资深采编人员的深度访谈,每次访谈时间都超过3小时。

相强化与矛盾冲突,以及在本文考察范围内所体现出的从官方到民间的在“落后/发展”叙事中的协作与矛盾。通过这三个层面的考察,本文将展示官方叙事如何构建一个“自然/必然性”论述(本文第三节),这种论述一方面呼应和反哺了在政治和商业机制下产生的“亮点式报道”(本文第四节),一方面将过去的历史记忆与“落后/发展”的宏大叙事重新连接,使得历史记忆作为象征资源在个体层面上合理化了“亮点式报道”,并引发了个体与时代脉搏共振的情感与想象(本文第五节)。

### 三、数据中心的“自然/必然性”与不可承受的历史之重

在几乎所有的官方的主流叙事中,我们可以将各大数据中心落户贵州的原因与理由归纳为三个方面:第一,当地政府先于全国所有地区的政策支持力度;第二,贵州的资源、自然环境等先天优势;第三,人才集中、产业集中等供应与产业链优势。其中第三点应当作为贵州大数据发展的结果而不是先决条件,所以实际上笔者在官方叙事中寻找到的最具体和反复出现的就是第一、二两点。其中政策性的支持不在本文的讨论范围内,这里不再赘述。本节重点考量官方叙事如何调用和重组在地性的历史记忆,从而建构出贵州发展大数据产业这一新兴媒介技术的合理性与必然性,创造出一种“自然/必然性”的论述,以及这其中夹杂着的不同层面的矛盾。

在官方叙事中,资源丰富、气候宜人与地质条件优良作为看起来像是同一口径的三大特点,是官方论述在合理化与必然化贵州大数据发展时集中呈现的贵州在地性先天优势。2014年中国移动云计算数据中心落户贵州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受到“凉爽的气候、丰富的能源、优良的地质条件和基础设施的吸引”<sup>①</sup>;还有时任中国电信董事长王晓初<sup>②</sup>、时任贵阳市委书记陈刚<sup>③</sup>等在接受媒体采访时都有同样论述。具体来说,首先是对贵州资源丰富的论述,如对贵州煤炭、铝、磷<sup>④</sup>等矿产资源以及水资源丰富的

① 时任中国移动总裁李跃的媒体采访,详见:金艾.贵州大数据产业风生水起[N].贵州日报,2014-01-28(8).

② 赵国良.中国电信云计算中心项目落户贵安新区[N].贵州日报,2013-07-03(1).

③ 孙惠楠.云计算资源产业联盟成立大会暨云计算资源平台上线启动仪式在北京举行[N].贵阳日报,2016-04-07(1).

④ 王太师.凉爽贵阳,中国数谷[N].贵州日报,2016-12-06(T11).

论述,从而使得贵州在电力资源上“水煤结合、水火互济”<sup>①</sup>。在地质条件优势上,官方叙述重点报道贵州喀斯特地貌的优势:其一,贵州不在任何地震带上,地质条件的稳定为数据中心的建设提供了安全因素。其二,喀斯特地貌所特有的大量山中溶洞与地下空洞结构,使得数据中心可以建在人工改造后的自然山洞中,从而得以节省服务器降温的成本。其三,是贵州气候和环境的优势,主要表现在52%的森林覆盖率带来的优质空气,以及年平均气温14—16摄氏度、夏季平均气温22.5摄氏度<sup>②</sup>的气候优势。

从一方面来说,以上三点贵州“自然”和“先天”条件的优势很大程度上是准确的。例如,数据中心数以百万计的服务器所产生的热能对降温需求巨大,水冷和空调系统对廉价并稳定的电力供应有极大的需求。另外,贵州的气温也为散热带来了相对小的挑战,而优质的空气使得服务器除尘成本大幅度降低。如耗资100亿元的腾讯七星数据中心,就建立在由自然溶洞经人工改造后的山体中,存放30万台服务器<sup>③</sup>。设计师通过特殊的设计结合山洞的特征,使得山洞在一年中70%的时间里可以采用自然风通过的方式对服务器降温<sup>④</sup>。由于其独特的设计与奇观性,我们可以在商业媒体、外媒报道中看到对这一数据中心的报道<sup>⑤</sup>。从另一方面来说,诉诸“自然”的叙事无疑在解释贵州发展大数据这一现象上为合理化与必然化提供了有力支撑。气候、能源与地质对数据中心的帮助无疑是一个事实,于是数据中心建立在贵州是“合理的”基础上。但更重要的是,这些条件都是“先天的”,而贵州自然资源的丰富、气候的宜人与地质环境的特点作为适合发展数据中心的先天条件,是全国其他地区所不能同时具备的,所以贵州最终会走上发展数据中心、大数据与云计算产业的道路也是“必然的”。我们不难从官方报道中感受到上述逻辑。然而如果我们尝试去解构这种论述,会发现其本身

① 大数据战略重点实验室. 中国数谷[M].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15:12.

② 大数据战略重点实验室. 中国数谷[M].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15:33.

③ 中国大数据产业观察.国家大数据(贵州)综合试验区[Z].[内部资料].

④ DENG I. Tencent builds giant bomb shelter in remote Chinese province Guizhou to house WeChat data[N/OL].South China Morning Post,2018-05-01.https://www.scmp.com/tech/enterprises/article/2144088/tencent-builds-giant-bomb-shelter-remote-chinese-province-house.

⑤ 例如《经济学人》的报道,The Economist. One of China's poorest provinces wants to be a tech hub[J/OL].(2018-06-02)[2022-03-10].https://www.economist.com/china/2018/05/31/one-of-chinas-poorest-provinces-wants-to-be-a-tech-hub;South China Morning Post的报道同上条注释。

对于历史记忆的调取和重组却又不见得那么“自然”(natural)或“理所当然”(taken-for-granted)。

比如对自然资源的论述存在着对历史记忆的调用的吊诡,具体而言,是一种对“自然”与“非自然”论述的矛盾。这里以官方叙事对“三线建设”与“西电东送”这两个项目的提及为例。从20世纪60年代起,随着中苏关系恶化,我国为了抵御潜在的战争风险开展了“三线建设”计划,大量向内陆战略后方地区迁移军工和其他工业企业与人才<sup>①</sup>。从1964年至1978年左右,在中央的支持下,贵州省累计完成近百亿元的工业建设,百万技术人才迁入,建立了14个工业部门与65个工业门类综合性城市<sup>②</sup>。90年代后,为解决我国东部工业密集地区用电问题,国家开展了“西电东送”计划,其中贵州又一次成为重点,承担了将乌江流域、南盘江、北盘江以及金沙江流域的水电资源输送到广东和华东地区的重任<sup>③</sup>。《中国数谷》一书就提到三线建设为贵州带来的航空、航天、军工企业等所具有的“强大科研助力”是贵州发展大数据等新媒体技术的资本<sup>④</sup>。在官媒报道中也有对“西电东送”项目的提及以及其为贵州所带来的电力资源与相关基础设施的建设<sup>⑤</sup>,通常作为对贵州水电资源丰富的说明和解释。但有趣的是,对这些项目的提及虽然从未淡出官方论述的视野,但是它们总是以一种被一笔带过的方式呈现出来。例如前文所举的《中国数谷》一书,虽然提及三线建设,但是仅有一个简短的自然段,远远不及该书在贵州自然资源、气候条件等先天优势上的长篇论述。“西电东送”作为贵州电力资源工业基础的重要体现,也总是出现在报道中,但同样总是被一笔带过。如对贵州通信管理局局长李德明接受媒体采访的报道,提到“贵州气候宜人,能源丰富,是西电东送的重要支撑地”,然后立刻转向开始讨论“政策优势”与“绿色、生态、活力”的工业发展特色<sup>⑥</sup>。在报道长江日报报业集团副总经理郑欣荣对贵州发展的评价时,说:“贵阳发展大数据绝非偶然。贵州贵阳电力充沛,能源富

① 李彩华.三线建设调整改造的历史考察[J].当代中国研究,2002(3).

② 许峰,田花.三线建设对贵州工业发展的贡献及其启示[J].理论与当代,2011(12).

③ 曾培炎.西电东送:开创中国电力新格局[J].中共党史研究,2010(5).

④ 大数据战略重点实验室.中国数谷[M].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15:33.

⑤ 孙维娜.大数据让贵阳站在了世界前沿[N].贵阳日报,2020-10-26(7).

⑥ 金艾.贵州大数据产业风生水起[J].贵州日报,2014-01-28(8).

足,是‘西电东送’的起源,是建立数据中心的优势之一。贵州贵阳多山地,地质灾害少,大数据中心建在这里,稳定性自然不言而喻。同时,气温较低,适于数据中心设备降温。不论是外部自然环境,还是数据安全以及硬件本身,贵阳发展大数据都是不二之选。”<sup>①</sup>

几乎所有类似的报道提及“西电东送”,都会作为贵州资源丰富的一个注释,但是几乎没有任何报道会进一步解释什么是“西电东送”,其为贵州带来了什么样的电力资源基础设施。这些历史记忆总是在被提到时未被加以解释地一笔带过,我们如何解释这种官方叙事中的蛛丝马迹?

如果仔细考量历史,可以发现,三线建设不仅仅为贵州带来了军工企业,还带来了以六盘水市为中心的大型煤矿开采集群以供应火力发电;因为需要将六盘水的煤矿运送到三线建设的另一个重点城市四川省攀枝花进行火力发电,贵州的第一条铁路“贵昆铁路”得以建成,以运输煤等资源<sup>②</sup>。三线建设还为贵州带来了从北方地区南迁并组建的以中国水利水电第八和第九工程局为核心的水利系统企业<sup>③</sup>,这些企业均在“西电东送”计划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仔细推敲不难发现,这些项目无一不是由国家主导的、人为的庞大政治、经济和工程项目,换句话说,相对“自然”而言,它们更多的是“非自然”的。

虽然在对当下发展的记忆建构中,官方叙事极力突出贵州先天条件的“自然性”所带来的大数据产业发展的“必然性”,但是自然资源必须通过涉及范围、资金、人力、政策等都极其庞大的“非自然”因素以及相关的工业基础设施才能被转化为供数据中心使用的水电等能源。而这些“非自然”的因素却总是被排在自然条件之后,甚至提及的频率远远低于对自然资源 and 环境的论述,似乎是害怕这些“非自然”的因素破坏了贵州

① 孙维娜.大数据让贵阳站在了世界前沿[J].贵阳日报,2020-10-26(7).

② NAUGHTON B. The third front: defence industrialization in the Chinese interior[J].The China quarterly, 1988, 115; MEYSKENS C F. Third front railroads and industrial modernity in late Maoist China[J].Twentieth-century China, 2015, 40(3); MEYSKENS C F. Mao's third front: the militarization of cold war China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20.

③ 笔者在田野调查中得知,贵州西电东送主要水电站,如洪家渡水电站、东风水电站等,以及贵州省范围内其他大型水利工程,如南盘江水电站、猫跳河水电站、红枫湖水电站等,均主要由三线建设时期组建并迁往贵州的中国水利水电第八和第九工程局承担建设工作。

先天“自然的”应该发展大数据产业与数据中心这一公共记忆的建构。这就造成一个现象:“自然”与“先天”优势的“必然性”论述想要极力避免上述“非自然”因素的干涉,然而这些因素又在事实上作为工业基础设施支撑着自然资源向工业化使用的转化。于是我们看到在官方对贵州数据中心发展所依托的“自然”叙事与“必然性”建构中,这些旧的历史记忆既格格不入,又无法被抛弃,总是如同幽灵般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出现,然后又被一笔带过。

另一个矛盾则是对贵州本身自然条件的论述,在这里,历史与现实以极其冲突的方式纠缠在一起,从另一个层面揭示了上一段所提到的对发展的“自然/必然性”的渴望。具体来说,贵州的自然条件在过去的记忆中更多的是一种发展的障碍、挑战和需要被克服的困难,但是同样的条件在对数据中心的集体记忆建构中却被重新调用、重组与再接连(re-articulate)成为先天的优势,成为“自然/必然性”论述的一部分。举例来说,贵州的喀斯特地貌与山区地形在当下的数据中心记忆建构中是贵州先天优势的体现,然而在上述被需要又被拒绝的基础设施建设的历史记忆中,同样的条件却有着不同含义。近如2010年《贵州日报》对西电东送的报道就提道,“贵州山区属典型的喀斯特地区,土层薄,蓄水保水能力差,而高山峡谷地形深切又使得取水难度大,工程性缺水问题仍然较为突出”<sup>①</sup>;更早一些时候,在贵州第一条大型现代化铁路“贵昆铁路”的建设中,山地所带来的困难也是铁道兵需要克服的重大挑战<sup>②</sup>。也就是说,在过去的发展建设中喀斯特地貌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和阻碍,但在今天的数据中心这里却成了先天的优势,而连接这两个世界的工业基础设施建设这一历史记忆一方面解释了这种连接,即基础设施建设克服了地貌的挑战,将虽然存在但不可用的先天资源转化为工业原料;另一方面又对今天的“自然/必然性”论述带来了危险,即当下的发展并非那么“自然”,而是建立在大量的人为的、机构与国家的决策等“非自然”因素之上,抛开这些历史条件,贵州并不是自然地或理所应当应该发展数据中心与相关产业。

当然,这并不是说昨天的困难不可以变成今天的优势,而是我们需要考量在官方与主流媒体对大众集体记忆的建构中,昨天的历史记忆如何与当下产生关联,并且如

① 贵州省统计局.西部开发十年,我省成就凸显[N].贵州日报,2010-12-29(5).

② MEYSKENS C F. Third front railroads and industrial modernity in late Maoist China[J]. Twentieth-century China, 2015, 40(3).

何在这种历史与当下的互动中协商与重塑。这种话语的变迁反映出新的语境的建立，而新的语境的建立势必涉及新的逻辑、关系与权力机构。笔者在对贵州本地的主流官方媒体的分析中观察到的是一种基于数据中心涌现的“自然/必然性”叙事的建构，而有目的地调用、重构甚至忽略历史记忆与在地性的历史因素。历史记忆以一种服务于当下的功能性展现在主流的官方叙事中，而主流的官方叙事并不能被简单地理解为意识形态宣传，因为其在对数据中心的当下集体记忆建构中所体现出来的对历史记忆的需要与拒绝，都参与了所谓“记忆实践”，并且以复杂且多面向的方式影响着公众对今天的新媒介技术——数据中心——的记忆建构。

#### 四、新闻生产与媒介记忆实践的可能性条件

将新闻生产作为记忆实践提醒我们“聚焦媒体记忆的生产与消费逻辑”<sup>①</sup>，也就是说，媒介记忆的生产、流通与接受均不能用简单的、决定论的方式来考量。文化研究学者霍尔在“编码/解码”一文中使用接连理论(articulation theory)的思想框架构建了媒介信息在传播过程中的复杂性<sup>②</sup>，也是在呼吁不能简单地用线性传播思维理解媒介的运作。无论是从传播政治经济学还是文化研究的视角，媒介记忆的生产都可以作为一个聚焦点来考量其复杂性与不稳定性。本节以“数据观”这一《贵阳日报》旗下的以大数据产业发展为报道核心的全媒体平台为案例，试图揭示在新闻与媒介记忆生产过程中的偶发性、不稳定性，以及其与更大范围的社会、文化、经济与政治因素的互动。这种政治经济学范式的讨论在考察记忆建构中是必要的，因为其展现了官方叙事是在什么样的条件下、在什么因素的影响下以我们所观察到的形式呈现。“数据观”的案例展现了“自然/必然性”论述所连带引出的“亮点式”报道一方面来自传统官方媒体平台的政治性与机构关系，另一方面也被市场化、资本化的运作机制进一步加固和扩大。这两种在历史上相互矛盾的逻辑——一个是反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新闻生产架构和报道方式，一个是资本主义全球化过程中新自由主义下的自由化、资本化运作——在对

① 李洪涛，黄顺铭.新闻生产即记忆实践[J].新闻记者，2015(7):39.

② HALL S. Encoding/decoding[J].Media and cultural studies: keyworks, 2001(2).

大数据产业发展的报道中却形成了互相协作与强化的现象。这样的组织机构与政治、资本所形成的多面向的集群并不直接作为行动主体去实施(perform)记忆工作和话语建构,但是却作为后者的可能性条件使得官方叙事得以以当前方式呈现。

笔者在采访“数据观”的一位记者时问到为什么在包括“数据观”在内的官方媒体叙事中总是反复强调贵州的自然条件,且“数据观”整理发行的出版物也总是聚焦在这些方面,笔者得到的回答是因为这些是优势,所以被反复报道,平台不会去报道劣势,不会报道失败的案例,因为对发展没有好处<sup>①</sup>。事实上,无论是“数据观”平台上的报道,还是其出版发行的如《中国数谷》等出版物,均体现出一种传统官媒式的“亮点式报道”,这种传播范式一方面类似于传统官媒的报道模式,另一方面又不同于过去政治宣传理念下的政治动员式报道,而是在当下时代语境中融入了资本主义全球化过程中的市场和商业逻辑。换句话说,虽然上一节揭示了一种近乎统一口径的政治宣传式官方论述的文本与象征建构,但我们不能假设这种官方论述与其对历史记忆的调用会无条件地被社会大众接受。我们需要考察这种官方语境形成的条件与其扩散到大众语境的方式。从现实来说,阅读机关党报的大众是少数,官方叙述更多的是通过“数据观”这样的新媒体部门的资源矩阵被扩散到微信公众号、今日头条等大众信息平台,从而将上文所述的官方叙事与记忆建构普及和扩散到日常生活中,使得官方叙事进入具体的个人和群体对贵州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的解释与想象中。尽管“数据观”只是一个上述类型的机构,但是通过对其组织结构与生产机制的讨论,我们可以一瞥当下社会语境中的新型“亮点式报道”的产生机制,从而进一步理解官方记忆建构中广义上的“记忆工作”。

要理解“数据观”的“亮点式报道”如何在政治机构设置与经济和商业逻辑的协作下产生,就必须揭示其在运营模式与行政机构设置上的细节。首先,它是商业逻辑在新媒体平台运营中的体现。在“数据观”的日常运作中,对数据中心、大数据技术等的相关报道可以被分为两类,即商业合作与政治宣传。商业合作的具体形式是多样的,概括来说,企业可以通过与“数据观”合作,以约稿、邀约采访和报道等形式,将“数据观”的全媒体平台作为企业的宣传和推广平台使用,而“数据观”在报道数据产业发展

---

<sup>①</sup> 笔者于2021年2月22日在贵阳市做的访谈。

的同时也获得了利润。诸如此类的商务合作通常以企业付费,“数据观”对企业已经成文的通稿进行编辑和发布,或派出采编人员进行采访报道的形式体现。这样的商务合作的发生,又在现实层面上依赖“数据观”作为官方背景媒体平台的权威性、与其他媒体机构地合作,以及机构本身通过平台的商业化运营对用户人群的积累。笔者在调查中并未获得具体的商务合作条款,但是在访谈过程中获知,这样的商务合作模式并不少,甚至在国有传统报社市场化、特定部门独立运营自负盈亏的改革大方向下,成为机构的重要收入来源之一。

在与企业进行商务合作和自身平台运营积累用户的基础上,“数据观”同时作为主要的新闻媒体,通过整合其自身与其他媒体的联络与资源,又将这种媒介资源转化为自身的议价资本。具体来说,“数据观”在日常的商业或政治宣传报道中与其他媒体机构建立起一个庞大的媒体资源网络,从而可以将本平台上的稿件以资源置换的形式分发到其关系网络内的其他媒体平台。作为回报,在其他媒体平台有相关需求的时候“数据观”也会转发、转载其他媒体的相关报道。这种媒体资源网络的形成,无疑也是使得企业付费进行宣发和报道的重要议价资本;而媒体平台的相互合作又以互惠共赢的方式创造了这样一个集合了各种地区性与跨地区媒体的资源平台,使得企业愿意为之买单。于是我们就得到了一个完整的商业广告媒体逻辑,即企业付费购买观众,媒体通过自身的平台运营与整合媒介资源扩大目标受众群体,使得企业愿意付费。这样的一种经济理性下的新闻与资本的结合,同时也为“亮点式报道”的风格做出了贡献:因为企业在宣传上的需求,导致新闻生产过程与报道形式不可能以批判性的或负面的方式呈现,而更多的是对产业发展、数据应用、数字化转型等“亮点”的宣传。

“数据观”作为官方背景的媒体,同时也以更加传统的形式参与对贵州数据产业发展的报道。在运营中,平台通常会收到各级政府部门的通知,让平台配合宣发相关的政府政策;平台也会派出记者参与各大机构、政府部门的新闻发布会,配合宣发通稿。同时,平台会不定期地对政府主管部门、企业高管和技术管理人员进行访谈,然后通过自身平台宣发相关的新闻和信息。从部门的构成来说,“数据观”本身30人左右的编制也基本以采编人员和新媒体运营人员为主,有的员工是在部门成立时从报社其他部门转调,新录用的员工也基本是语言文学与新闻传播背景。换句话说,在一个以对数据中心、大数据技术、云计算等前沿新媒介技术的报道为核心的机构中,并没有数据相

关专业背景的工作人员,而是保持着一种传统报社的采编人员设置。作为一个官方媒体,平台成立的初衷就是为了向全国展示贵州大数据产业的发展,其在人员构成上又沿袭了传统报社的组织结构,这就难免在新闻生产实践中陷入报喜不报忧的风格。

上述的商业逻辑与传统官媒逻辑的结构,在对数据中心与数据产业发展的集体记忆建构中互相协作,从结果上来说促进了“亮点式报道”的产生。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到,作为一个具有本地性与全国性影响力的媒介平台,“数据观”所体现出的“亮点式报道”既有其作为官方媒体和传统党政机关报社的因素,也有更加商业化、资本化运作下新媒体环境的因素。而这两种逻辑并不是理所应当或自然而然地结合的,无须返回到太久远的历史,我们就能找到社会主义新闻生产与资本主义商业逻辑的冲突和矛盾。所以我们不能简单地将这种亮点式报道理解为其作为官媒的历史惯性。然而为什么看似矛盾的两种逻辑在当下的社会语境中互相协作、互相强化?应当看到,在资本主义全球化的过程中,新自由主义所鼓吹的“私有化”在传统官方媒体市场化转型中以“自负盈亏”的方式体现,从而将媒体推向了自主盈利的需求,在市场化与资本化的逻辑中,“广告”与“新闻”的边界不再清晰。所以虽然底层意识形态与逻辑不通,甚至冲突,但是传统官媒的报道范式与资本逻辑下的“广告新闻”在当下的政治宣传需求、本地发展合理化的社会与文化需求中形成了一个有时代特殊性的“临时性同盟”,或者说一种“霸权”(hegemony)。在互相协作与强化中,进一步巩固现有的权力结构,并强化了“亮点式报道”。

这样的同盟是值得批判性的反思的。一方面来说,资本与新闻、新媒体的融合所产生的困境早已有之。在传播学研究的历史中,批判研究(critical research)与行政研究(administrative)之争展现了早期公关、广告在资本影响下对大众传播的影响<sup>①</sup>;传播政治经济学的观点提醒我们媒介如何生产新闻、被谁拥有、被谁购买等问题都会在

① LAZARSELD P F. Remarks on administrative and critical communications research[J]. Zeitschrift für sozialforschung, 1941, 9(1); SMYTHE D W, VAN DINH T. On critical and administrative research: A new critical analysis[J].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1983.

新闻的生产中产生影响<sup>①</sup>,以及新闻生产中的专业性与经济性问题<sup>②</sup>的困境。资本逻辑的融合,也使得我们必须思考在媒体的运营过程中主动嵌入基于用户画像描绘(social profiling)、用户数据的挖掘与数字剥削<sup>③</sup>的监控资本主义(Surveillance Capitalism)<sup>④</sup>之中。另一方面,虽然上述困境本文无法具体展开论述,但是传统政治宣传与资本广告新闻的同盟却无疑是本文案例中官方语境下的记忆建构如何通过“数据观”之类的新官媒,通过“亮点式报道”扩散到大众语境的重要条件。

在访谈中,“数据观”的工作人员告诉我,他们是把“数据观”的网站作为工具书一样的性质来打造的,即你可以在这里找到全面的大数据产业发展政策、资讯、案例和相关报道。但是在实际的新闻生产过程中,可以观察到“数据观”并不仅仅作为工具书存在,而是在政治和商业两个层面影响着更广泛的新闻生产、信息分发和流通。而这种影响力并不仅仅是这一个平台的独立特征,而是嵌入了一个在传统媒体面临新媒介技术转型与新自由主义下的市场化、资本化和私有化潮流中由若干媒体所组成的媒体资源网络中。换句话说,不仅仅是“数据观”面临上文提到的困境,众多媒体在面对这些困境的过程中又在资源互换、市场议价的逻辑中互相连接组成一个资源网络。经济与资本的逻辑通过这个网络,倚靠传统媒体自营与商业化的趋势,将其影响力分发到网络中的其他媒体平台。而“亮点式报道”在政治和商业的互相协作下,通过新媒体网络

① MOSCO V.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ommunication[M]. 2ed. London: SAGE Publication, 2009; NIXON B. Critical political economy of communication and the problem of method[M]//Marx and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media. Chicago: Haymarket Books, 2015:260-283; HARDY J. Critical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media: an introduction[M]. New York: Routledge, 2014.

② NADLER A, VAVRUS M. Critical voices in the future of news debates[J]. The communication review, 2015, 18(2).

③ 西方传播政治经济学者对类似用户画像等技术所涉及的数据掠夺和数字剥削有深入的讨论,例如 Joseph Turow 对用户画像(social profiling)的讨论(TUROW J. The daily you: how the new advertising industry is defining your identity and your worth[M].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2.), Vaidhyathan 对谷歌与脸谱通过数据监控破坏了互联网的平等性,置用户于数据的剥削中的讨论(VAIDHYANATHAN S. Antisocial media: how Facebook disconnects us and undermines democracy[M].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8; VAIDHYANATHAN S. The googlization of everything(and why we should worry)[M].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12.)。

④ ZUBOFF S. The age of surveillance capitalism: the fight for a human future at the new frontier of power[M]. New York: Hachette Books, 2019.

被扩散到不同的大众信息平台上,从而使得官方叙事渗透进入大众的日常生活,被大众所熟悉和接受。

本节通过“数据观”的案例强调和揭示了官方叙事的生产条件与扩散机制。一方面,如果没有上述“亮点式报道”在政治与资本逻辑同盟下的产生与强化,官方叙事所产生的记忆建构无法落到社会群体与个体身上,记忆工作也就无从谈起。换句话说,正是本节所述的政治经济网络,使得官方叙事的记忆工作得以从文本建构进一步扩展到大众接受,从而使得集体记忆的建构成为可能。另一方面,这样的观察促使我们抛弃一种简单的权力模型,即政府的意志与政治的力量完全主导官方报道的论述与对大众记忆的建构。需要认识到,即使是在官方媒体的框架下,政治与机构也仅仅只是组成复杂权力结构的一部分。在新的社会语境下,新的关系和同盟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被建立,从而维持当下的社会权力结构。在这个结构中,社会主义新闻生产与资本在发展语境与对个体参与的需求下形成同盟,从而使得官方论述全方位地扩散至大众。

## 五、个体与主流叙事:记忆工作的最后一个环节

如果说官方语境建构通过对历史事件和在地历史记忆的调用与重组建构一个理想的“自然/必然性”存在的发展数据中心和大数据产业的贵州,而这种语境的建构一方面依托于处在传统的官媒行政体系与资本和商业逻辑的交染中的新官媒平台,另一方面新官媒平台在政治经济机制下维持和强化了“亮点式报道”特性,通过这一特性与新官媒平台在新媒体改革与商业逻辑下形成的媒体资源网络矩阵,官方叙事得以扩散到大众媒体和信息平台,使得记忆工作从文本和象征进入受众和个体,从而进一步形成大众语境与集体记忆的建构。那么,在这个过程中,个体又是如何合理化“亮点式报道”所呈现的官方叙事?换句话说,如前文所述,我们不能假设一个完全控制大众舆论和心理的官方政治力量让官方叙事自上而下地被大众接受,从而形成集体记忆的建构,而应当考量官方叙事中所调用和重组的历史记忆如何成为象征资源在个体层面产生意义,从而使得“自然/必然性”论述被个体合理化地接受,用来解释和想象他们自己和他们所生活的土地过去、现在和未来。虽然这种个体与官方叙事、机构与更大的政治经济结构的互动往往充满了“协作”与“冲突”,一方面让笔者观察到官方主流叙事

在个体记忆层面上的塑造性力量,另一方面也体现出其中的不稳定性,但是如果没有官方叙事与个体经验的“协作”,那么记忆工作就无法完成最后一环,进一步形成集体记忆建构。笔者认为,发展语境与对个体参与时代进程的主体位置(subject position)需求,形成了前文所讨论的所有或矛盾或协同的现象在新的社会语境中形成同盟的基底。

具体来说,在思考主流叙事与个体记忆和体验的“协作”是如何体现的这一问题时,笔者观察到,官方所建构的对数据中心的“自然/必然性”叙事在不同人群中都产生了基于“落后/发展”这一语境的强烈的本地认同感,从而使得个体不去探讨官方论述的合理性,因为发展语境下的本地认同感超出了主流叙事中甚至是个体记忆中的矛盾,从而使得个体产生一种与时代脉搏共振的认同感。

例如,在对某本地软件开发公司的员工进行访谈时,李许(化名)提到,作为一名家乡在贵州、到北京学习软件开发并留京工作过一段时间的软件工程师,看到数据中心的拔地而起与贵州今年来大数据的发展,觉得“贵州还是挺强的……贵州也不差……以后科技会更上一层楼”。尽管李许对贵州在发展大数据产业过程中的各种失败案例都表示认同,甚至认为“大数据”仅仅只是一个噱头,而贵州在数据产业上的发展实际上根本达不到真正的“大数据技术”的全面落地,但他依然认为贵州现在的发展有了长足的进步并对未来充满期望。在与李许接近三个小时的对话中,笔者能够强烈地感受到其谈论贵州数据产业发展时作为参与者与贵州人的自豪感。<sup>①</sup>

同样,在对新闻采编人员的采访中,也无时无刻不流动着作为贵州人的自豪感与认同感。比如“数据观”的记者就对笔者说,“自信心”是他总结的贵州近几年发展数据中心和数据产业的第一个关键词,其具体体现为“增强了对发展的期望,重拾发展的信心,有机会改变贫穷落后的现状”。另一位编辑人员家乡在更加贫穷落后的黔西南地区,也对笔者讲起这些年来贵州在基础设施建设上的发展(如高速公路、高铁等)对过去落后的情况的改变。她与笔者谈起过去从家乡到省会贵阳需要坐一天的车,但是现在坐高铁只需要18分钟。当笔者问起那这和大数据有什么关系时,她认为其实一切都是大数据,大数据作为一种基础设施,与高速公路和高铁也是密不可分的。而作为

<sup>①</sup> 笔者于2021年2月22日在贵阳市做的访谈。

贵州人,能见证这种发展是让人自豪的。这两位工作人员都对笔者表示,他们并不是机械地把官方叙事写在他们的报道和出版中,而是深刻地相信贵州通过数据产业发展所获得的进步与现代化。其中一位记者告诉笔者,他正是因为对贵州的数据产业发展感到自豪,希望为这一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从而加入“数据观”,从一名公益工作者转行成为贵州数据行业发展的报道者。也就是说,作为新闻的生产者,笔者所提及的记者和编辑首先是在个体层面上通过“落后/发展”语境理解了官方的叙事,在强烈的自我和本地认同中投身对数据产业进行报道的行业。

“落后/发展”语境的带入在笔者的调查中在个体层面上是一种广泛存在的现象。也就是说,“自然/必然性”的官方叙事在与个体产生互动的时候,在一个相对大的范围内(至少在笔者的调查与观察范围内是这样的)唤起了本地人在“落后/发展”语境中对过去苦难的记忆,并将今天的现代化、城镇化等所带来的变化置于这个语境中,通过重拾过去作为贵州人“天无三日晴,地无三里平,人无三分银”的记忆,建立了一种地区性的认同感,从而进一步引发了个体对时代的参与感与自豪感。在这种对过去、现在和未来的解释与想象中,“自然/必然性”在个人与当地认同感上被自然化,成为解释与想象的一部分。而任何对这种“自然/必然性”的怀疑都会与时代的脉搏相斥,从而挑战个体的自豪感与认同感,所以是无法被接受的。而“落后/发展”语境则使得本地人对具体的科学技术——大数据、云计算、数据中心等——的想象被发展所获得的改变和结果所替代。换句话说,在“落后/发展”的现代性语境中,重要的是“科技”带来的“发展”,而具体“科技”是什么,变得不那么重要。这就使得大数据、云计算与数据中心作为实体的具体技术变得不那么重要,它们作为一个个抽象的“概念”使一切合理化,可以解释一切,从而被接受。在发展语境与参与时代的发展这一主体位置的基础上,“自然/必然性”语境也好,政治与资本的同盟也罢,都合理地、协作地、有机地结合成为当下时代语境的一部分,使得个体、机构、民间与官方在同一个官方语境与记忆建构下和谐共存。

## 六、结论

本文试图以一种非线性的、非决定论的视角,考察“数据中心”在地性的媒介记忆

建构过程如何涉及了包括政治、经济与个体体验不同维度上的互动。笔者试图在看似统一化、普及化、单一化的官方媒体叙事的表面下,寻找“不自然的”、偶发的、“不理所应当的”因素,从而揭示在媒介记忆建构与数字记忆发展下被忽略的权力关系和结构。通过观察和分析,笔者认为贵州省在构建围绕数据中心与大数据产业发展的官方叙事中,调取和重组贵州省在地性的历史记忆来合理化、自然化和必然化数据中心的发展,建构出一种“自然/必然化”的发展叙事。而这种文本层面上的官方叙事需要通过一定的方式被扩散到大众语境中,“数据观”的案例揭示了新媒体改革下的官媒如何在政治惯性和资本逻辑的合力下维持和加强了“亮点式报道”特色,并通过其媒体资源矩阵“将亮点式报道”分发到更多的媒体平台,从而使得官方叙事被扩散到大众语境中。笔者认为,机构的结构与机构运行的逻辑,虽然不直接实施符号意义上的记忆工作,但是却作为官方记忆建构的可能性条件使得后者的生产和流通成为可能。而这种关系往往是互构的,也就是说在上述的基础上,官方语境和记忆建构同时也作用于机构、政治和经济关系并塑造它们。而个体的接受往往标志着集体记忆建构的可能性,所以必须讨论个体体验如何与官方叙事互动。本文揭示了个体通过“落后/发展”语境理解和想象数据中心产业和技术,并合理化历史记忆中的苦难,从而进一步产生时代发展的参与感与本地认同的自豪感。这一过程形成了集体记忆建构的基础,使得通过官方叙事对历史记忆的重组,从文本到最终个体的接受成为可能。

需要说明的是,笔者并不认为本文所揭示的从个体到机构、从民间到政府的广义的记忆工作与象征意义的建构是无懈可击的。恰恰相反,本文成文的目的就是要揭示这个看似完满的过程是特定历史、政治与经济条件下的产物,其中充满了对特定记忆的重新组合、不同逻辑的临时性同盟,以及个体的记忆与集体记忆的建构在协作与冲突中的交织。虽然对矛盾和冲突进一步的论述不在本文的重点讨论范围内,但笔者认为对数据中心之外的关注是我们进一步理解“新媒体技术在相对落后地区落地”这一现象的重点。例如,笔者在调查中发现,包括“数据观”在内的主要官方媒体在对数据中心进行报道时,往往只关注了数据中心之内,而忽略了围墙以外的地方。换句话说,数据中心作为一个物理性的庞然大物,对周边的环境、人和土地造成了什么样的影响,这并不在官方叙事的考量范围内。这促使笔者提出,谁有权力决定谁的记忆,以什么样的方式、在哪里被纳入集体记忆建构的范围和过程?我们看到,被数据的迷思所边

缘化的不仅仅是对“数据中心”的媒介记忆建构本身所包含的矛盾性,同时还有相当一部分的土地、人与他们的历史、记忆与生活方式被排除在外。而这一部分,恰恰是本文第一、二节所讨论的数字记忆的物质性框架下被忽略、被边缘化的部分。笔者相信对数字记忆的物质化及其引发的相关问题的考察,或许可以成为一个回答上述问题的方向。